

杨宇菲：在生活日常里看见文化脉络

► 学生记者 江南

春节前后的澳门，游客涌向大三巴和酒店商圈，杨宇菲却钻进了红街市、舞狮社团和普通人的家门。

红街市里，鱼贩一边摆着年货，一边讲起街市里的节俗；街头上，结义堂的舞狮队从老师傅到小徒弟依次上阵，把锣鼓声带进大街小巷；土生葡人家庭贴起中葡双语的春联，缅甸归侨写下缅甸文的红纸祝福……这些很少出现在旅游宣传册里的日常场景，构成了杨宇菲眼中的澳门春节。

2023年，在澳门科技大学工作第二年，杨宇菲开始拍摄“澳门春节”纪录片。为此，她跟着鱼贩备货、跟着舞狮队排练，也走进不同家庭过年。一张由街市、社团、族群和家庭共同组成的文化网络，逐渐在她的镜头下交织成形。

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影视传播方向硕士，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博士；从参与“中国节日影像志”系列拍摄，到独立完成纪录片《姑婆》、担任纪录电影《大河唱》的前期调研和执行导演，再到如今于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纪录片，杨宇菲始终以“人类学”的方式拍摄“纪

杨宇菲



现为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、社会科学学院人类学博士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类学和影视人类学。曾在中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，出版专著《再造“祖先”的文化实践：韩江上游合姓祠堂与地域社会》。主要纪录片作品《姑婆》《大河唱》《贵州漳江流域水族卯节》《广东梅县中元节（VR）》《龙与狮的交汇》。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“中国节日影像志”子课题“春节（澳门特别行政区）”。



录片”：让摄影机贴近真实生活，在日常里看见文化脉络，并将人类学视角带回课堂，影响着一批一批新的学生。

“用写论文的方式拍纪录片”

杨宇菲本科就读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。保研时，她面对多个选择，但她坚定地选择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。“我就想做纪录片。”她面试时这样回答老师。

进入清华后，她发现纪录片并不只是“拍片子”。“用写论

文的方式拍纪录片”是她在清华学习到的第一课。纪录片不仅要记录发生了什么，更要像做研究一样进入田野、深度调研，在日常生活中理解人与社会的连接。

2014年，正在新闻与传播学院攻读硕士的杨宇菲参与“中国节日影像志”贵州水族卯节拍摄。

“中国节日影像志”项目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小军主持，项目启动时，导师雷建军在学生中征集拍摄成员，她报名参加。那是她第一次真正进入人类学田野。

一开始，她用时间线串联纪



杨宇菲在澳门街头拍摄澳门春节

录片：过节前，人们怎样准备；过节中，仪式怎样展开；过完节，村寨怎样恢复日常。但张小军老师直言“这是没文化的体现”。他告诉杨宇菲，如果只是把仪式流程从头到尾记录下来，拍到的只是热闹和表象；真正有价值的，是透过这些表象去理解背后的文化结构。

张小军老师给了她重要启发，镜头要像做人类学研究一样，先提出问题：这个节日为什么存在？它对当地人意味着什么？它维系着哪些关系？拍摄之前要做田野

调查，拍摄过程中要不断验证自己的判断，最后还要从大量素材中梳理出背后的文化逻辑。

于是，在杨宇菲的镜头下，卯节像一条线，把分散的村寨串联起来，也把人们带入同一个共同体。杨宇菲意识到，纪录片不仅是记录，更是一种研究，研究支撑节日运转的社会结构，研究仪式背后的人际关系、文化逻辑和共同体秩序。

这是人类学训练带给她的观察世界的新方式。

这种方式也影响了她对澳门

春节的拍摄。澳门春节同样很热闹：红街市、鱼贩、舞狮社团、土生葡人家庭、缅甸归侨春联……但有了卯节的经验，她不会只把这些当作多元文化的符号来拍，而是继续追问：为什么不同族群能在同一个节庆空间里共享春节？为什么这种多元不是边界，反而成为澳门社会的日常秩序？她借由街市、社团、家庭和巡游，把澳门春节作为一个观察地方社会的入口。

“我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。”她半开玩笑地说。所谓“有文化”是面对日常生活时，能看见其背后的制度、关系、历史和意义。

《卯节》评审时，一位当地老人拉着他们的手，感谢他们拍下了这个节日。随着生活方式变化，村寨之间共同过节的方式正在悄悄改变，如果没有这些影像，年轻一代未必知道过去的节日是什么样。杨宇菲被深深触动。如果只是拍一个村子、几个寨子，可能留下的是局部的流程；但如



纪录片《卯节》



纪录片《卯节》画面



《大河唱》拍摄期间的工作照



杨宇菲赴澳门工作前与张小军（左1）和雷建军（右1）两位导师合影

果记录了节日背后的共同体结构，保存下来的就是一个民族更核心的文化逻辑。正因如此，她觉得这件事比单纯做一份纪录片工作更有意义，于是决定跟随张小军老师攻读人类学方向的博士学位。

从那以后，她在纪录片里，研究一场节日如何连接村寨，研究一座城市如何在春节里容纳不同族群。清华给她的训练，也由此从一种创作方法，变成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“影像温暖世界”

在杨宇菲之前接触过的独立纪录片里，影像里的现实常常粗粝、残酷，带着强烈的批判性，人物也多处在边缘处境里。清影提出的“影像温暖世界”让她好奇：纪录片面对的明明是复杂甚至沉重的现实，影像究竟怎样才能温暖？

后来的拍摄实践慢慢给了她

答案。

《卯节》之后，杨宇菲回到家乡广东梅县，开始拍摄自己的硕士毕业作品《姑婆》。这是她独立完成的第一部长纪录片。

姑婆起初笑说自己“背又驼，走路又歪歪斜斜”，没什么可拍。杨宇菲知道，如果只是坐着采访，姑婆很难回答“生活意义”这样宏大的问题，于是许多访谈都是在吃饭、做饭、睡前聊天时自然发生的：她拍一会儿，又放下机器去帮忙；再拍一会儿，再回到生活里。

拍摄《大河唱》时，她进一步意识到，建立真实关系是拍摄陌生文化的前提。作为前期调研和执行导演，她跟随团队进入西北，接触秦腔、陕北说书、皮影等民间艺术。拍摄陕北说书艺人刘叔时，这种体会尤其深。刘叔起初觉得走在路上有人跟拍，显得“很威风”，但过了一周，新鲜劲儿过去，摄影机就成了打扰。

他开始问摄制组到底要拍什么。

一天清晨，团队刚到他家，他从炕上坐起来就拿起三弦说书，像是想尽快完成任务，把他们打发走。

后来，团队停止拍摄，摄影师用方言和他聊天，聊他的过去，也聊他的日常。那段时间刘叔生病，团队每天开车带他看病，照顾他的起居。慢慢地，刘叔开始打开心扉，讲述自己这些年如何养大孩子，说书之外如何干过包工头等别的活计，如何在时代变化中一点点磨练自己。镜头前的刘叔，从陕北说书艺人，变成一个父亲，一个普通劳动者，一个在时代的浪潮下奋力生活的人。

这也是杨宇菲所理解的“影像温暖世界”：拍摄对象不是素材，也不是符号。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都是主角，纪录片要做的，是走进他们的生活，理解他们的处境，让一个个真实的人慢慢显现出来。



2024年4月24日，澳门科技大学举办清影记录电影展映活动



学生在红街市鱼贩家中拍摄澳门过年习俗



学生在澳门街头拍摄舞狮社团结义堂

从田野到课堂

如今，杨宇菲在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纪录片，她说，自己“完全按清影这一套方法在教学”：用一个学期，让学生完成一部纪录片。

在她的课堂上，纪录片不单是影像作业，更像一场田野训练，学生要从自己的好奇出发，寻找田野点和拍摄对象，尽可能与对方共处一段生活，再用日常记录呈现不同的生活样貌，学习如何在习以为常的事务中看见文化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理解社会。

这种教学在澳门有特殊的意义。许多内地学生来到澳门时，对本地社会了解有限。纪录片课程把他们带进街市、社团、庙会、社区和家庭，让他们在拍摄中重新

认识这座城市。杨宇菲的学生中，有人拍舞狮社团，有人拍街市鱼贩，镜头下，一个个原本陌生的生活场景被连接起来，澳门也慢慢成为由日常关系、节庆实践和多元文化共同构成的地方社会。

在内容生产越来越快的时代，杨宇菲反而更强调“慢”。她会鼓励学生把纪录片剪成短片段，吸引更多人快速了解作品，但她始终提醒学生，碎片化传播拓宽了影像触达观众的路径，却不意味着对人的理解和对文化的探究变得不再重要。

她相信纪录片拍摄者需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历史学的知识基础。在信息快速流动、拍摄技术门槛逐渐降低的当下，只有通过长时间的观察相处，以及扎实的

理论积累，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、一种生活方式、甚至一种文化结构。

除了对内容深度的追求，她也把纪录片伦理作为课堂训练的重要部分。拍摄对象对镜头说的话，有时是出于对导演的信任，并不意味着可以毫无保留地面向公众。她要求学生，公开传播前要让拍摄对象看过；如果对方不同意，就不能公开。片子完成后，也应给拍摄对象留一份。对伦理边界的谨慎，以及对被拍摄者的尊重，同样是纪录片训练的重要部分。

于日常生活中见文化，在深度交往中感受温暖，这正是杨宇菲的纪录片之路，也是她从田野到课堂始终不变的方向。📖